

美国「新闻界第一夫人」

海伦·托马斯 著

Helen Thomas



夏蓓蒂娜·舒 / 译

展江 龚小夏 钱文琴 曾彦 / 审校

民主的看门狗？ Watchdogs of Democracy?

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

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Watchdogs of Democracy?

民主的看门狗？

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

海伦·托马斯 / 著

夏蓓蒂娜·舒 / 译

展江 龚小夏 钱文琴 曾彦 / 审校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的看门狗?: 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 / (美) 海伦·托马斯 (Helen Thomas) 著; 夏蓓, 蒂娜·舒译. —广州: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652-898-3

I. 民… II. ①托…②夏…③蒂… III. 新闻工作—研究—美国
IV. 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905 号

民主的看门狗? ——华盛顿新闻界的没落及其如何使公众失望

(美) 海伦·托马斯 (Helen Thomas) 著 夏蓓 蒂娜·舒 译

出版发行: 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 (020) 87373998-85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投稿热线: (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 (020) 87373998-8502

网址: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文版序

龚小夏

在华盛顿新闻界的一次聚会上，我听到担任过里根和老布什两位总统的新闻发言人的马林·菲茨沃特提起白宫记者团团长海伦·托马斯的两件逸事。

自从托马斯进入白宫记者团以来，她总是风雨无阻地坚守在那里。菲茨沃特是个早起的人，每天清晨6点钟就会来到办公室，可是托马斯总是比他早一步就等在那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她永远能够第一个知道。有一次，菲茨沃特忍不住对布什总统说：

“你知道，海伦每天早上6点以前就来了。”

总统摇了摇头，似信非信。过了几天，菲茨沃特在6点钟刚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总统推开他的门，探了一下脑袋。原来，他是来看看托马斯到底有没有那么准时。当然，这天和往常一样，托马斯是那里面少不了的角色。布什这才相信他的新闻发言人所言不虚。

另外一次，是托马斯跟随里根总统到苏联去。总统身边的保安向来都非常严密，更不用说还有苏联方面的警卫人员了。这天早上，南希·里根决定不告诉苏联人，带着几个随从擅自到红场上去转一圈。善于打探消息的托马斯也跟着去了。里根夫人到了红场上，很快吸引了许多前来打招呼的市民。

苏联的保安人员闻讯赶到，穿过人群，将里根夫人护送回住处。在这个过程中，个子矮小的托马斯从高大的保安的胳膊下挤到了中间。苏联保安见状，立即将这个他们不认识的人按倒在地上。南希赶紧大叫：“她是和我在一起的！”苏联人才将托马斯放开。

回到住处之后，南希将红场上发生的这一幕告诉丈夫。向来以幽默感著称的里根于是说：“你怎么不趁这个机会把她甩开？”这件事成为当年媒体中流传的一段趣话。

在华盛顿新闻界，像海伦·托马斯那样勤恳的记者不在少数。像揭露出水门丑闻的鲍勃·伍德沃德和不久前猝然逝世的提姆·拉瑟都是有名的工作狂。托马斯是这些名记者中资格最老的人之一。在她入行的时候，女记者的数量还很少。有人曾经问托马斯：“你能够引起总统们的注意，是不是因为你女性的吸引力？”托马斯回答：“我可没有那个潜力。”的确，与如今电视上那些漂亮的女记者和主持人相比，做纸媒的托马斯能在这行出人头地，靠的完全是出色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

以这样的背景出身的托马斯，难免会对今日传媒中各种各样轻浮与不负责任的现象感到不满，这一情绪在《民主的看门狗？》中得到了详尽的表达。虽然有时候托马斯的批评显得有点极端，但是她对美国媒体历史和现实的描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新闻发展图景。希望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的读者能从中受益。

2008年9月29日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作者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美国传媒界资深人士、专栏作家）

致谢

我受惠于许许多多的朋友和新闻界的同事，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写完了这本书。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的代理黛安娜·奈恩（Diana Nine），她拥有法学学位，对我写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章节以及联邦盾牌法（shield law）^①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

我永远记得玛格丽特·基尔戈（Margaret Kilgore）给予我的帮助，从我们一同在合众国际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共事那时起她就是我的好朋友。她是一名优秀的主编，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极大的支持。她无私地把自己的经历，包括在越南战争期间做战地记者和在《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当记者时的感受告诉我，这令本书生色不少。

我想，若没有玛格丽特·基尔戈和黛安娜·奈恩的共同努力，本书不可能问世。

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Scribner）的编辑莉萨·德鲁（Lisa Drew）始终关注和帮助我，直到我完成本书。

我非常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与我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新闻岁月，不仅告诉我他们的逸闻趣事、悲怆苦难，更给了我真诚的关注。他们有关战争故事的回忆是如此生动而富有卓见，令人仿佛置身其中——我们曾经见证历

①“盾牌法”是基于鼓励揭露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信息而向记者提供保护消息来源特权的法律，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通过了各自的盾牌法，但在联邦一级还没有同类立法。——译注。下同。

史，并且感受其宏大的场景。我觉得，他们与常人不同之处就是他们对新闻工作无条件的爱。

我还要感谢查尔斯·“查克”·刘易斯（Charles “Chuck” Lewis）对我的理解、鼓励以及对本书应该具备怎样的锋芒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他是赫斯特报系（Hearst Newspaper）华盛顿分社社长，也是我的顶头上司。

还有，曾经与我在合众国际社共事的女记者格温·吉布森（Gwen Gibson），她后来去了《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她在开始阶段为本书所作的调查对我的帮助是无法估价的。我要感谢的另一位是苏·门迪托（Sue Menditto），她是一个互联网高手，为我查找了许多重要信息。

2005年白宫记者团的优秀记者给了我许多灵感：保罗·麦克马斯特（Paul McMaster）——自由论坛（Freedom Forum）组织的领导，他对于美国媒体现状有大量独到的观察；我也得益于罗恩·科恩（Ron Cohen）的想法，他是前合众国际社编辑主任以及《今日美国报》（*USA Today*）的主编；我也非常感谢我以前在白宫作报道时的同事阿尔文·斯皮瓦克（Alvin Spivak）和艾拉·阿伦（Ira Allen），以及国防事务记者保罗·曼恩（Paul Mann）。

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ABC-TV）的萨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奈特—里德报系（Knight Ridder）的索尔·弗里德曼（Saul Friedman）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前执行主编本·布拉德利（Ben Bradlee），帮助我了解传播领域的新趋势。

还有其他来自合众国际社的同仁也给了我极大的支持。曾任职于《新闻日报》（*Newsday*）的帕特·斯洛扬（Pat Sloyan）和奈特—里德报系的专栏作家乔·加洛韦（Joe Galloway），他们都曾任职于合众国际社；还有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驻联合国首席记者伊迪丝·莱德勒（Edith Lederer）。

我很高兴有机会与汤姆·约翰森（Tom Johnson）深入交流，他从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退休之前在印刷业和电视传媒业都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还有全国公共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的丹·斯科 (Dan Schorr), 以及《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 的迈克尔·赫奇斯 (Michael Hedges) 。

我还从美联社资深记者和主编梅里尔·哈特森 (Merill Hartson) 那里了解了对新闻界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看法。

其他帮助我的人有：赫斯特报系的克里斯汀·科利 (Kristin Collie) 和奈恩女士的助理克莱尔·芬利 (Clare Finly)；丹尼森大学 (Denison University) 新闻学教授苏珊娜·康德拉里 (Suzanne Condrary) 博士帮助我很好地洞悉了今日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奉献精神；新闻学教授保拉·麦肯齐 (Paula McKezie) 也是一个电脑高手，她帮助我在互联网上找到有关素材。我还要感谢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美联社摄影师罗恩·埃德蒙兹 (Ron Edmonds) 。

我还非常感谢我的外甥埃迪·戈哈 (Eddie Geha) 和史蒂文·戈哈 (Steven Geha)，他们在互联网上帮我搜寻有关新闻自由的信息以及媒体在最新民意调查中的排名。

而我的家族永远给了我精神支持：我的兄长马特·托马斯 (Mate Thomas)，我的妹妹伊莎贝尔·托马斯 (Isabelle Thomas)、表妹约瑟芬·格哈 (Josephine Geha) 和芭芭拉·艾萨克 (Barbara Isaac)，以及我的多个外甥特里·德莱昂 (Terri DeLeon)、朱迪·詹金斯 (Judy Jenkins)、珍妮特·格里格 (Janet Grigg) 和乔安妮·斯旺森 (Joanne Swanson) 。

我真的为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家族，还有这么多的好朋友和职业同道而感到幸运，是所有这一切人造就了我。

前言

对于新闻工作者而言，新闻事业是一份高尚美好，令人魂牵梦萦、无法释怀的事业，于我而言也是如此。

我曾经有独一无二之幸专职报道过九任美国总统^①。有时候，我会对他们怀有同情之心，有时候又带着愤怒之情，但是，更多的时候我是带着批评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因为我坚信，他们本来都能够为这个国家做得更好。

现在，我要用同样的眼光来审视新闻界，或者目前统称为传媒的行业。这个行业中应具有的某种至关重要的特质已经丧失——或者说，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忘记，他们的使命是无私无畏地追求真相，只要真相在引导他们。自由媒体的目标应该是事实真相，而不是某种既定计划。

我并非怀旧，而是事实让我相信，这个行业的黄金时代是在20世纪，只不过那时我们都没意识到这一点。

新闻记者，是公众的信息提供者，他们是民主的看门狗。没有知情的民众，就没有民主可言。对当权者提出尖锐的问题，并且督促他们真实、完整、诚实地实践他们对公众的承诺，是记者和编辑的使命。这应该是这个行业不变的准则和规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闻业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往往并不见得往更好的方向走。

科技发展使广播电视在信息传输方面相较传统的纸质媒体有着无可比拟

^①海伦·托马斯从进入白宫记者团到离开，共面对过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吉米·卡特、罗纳德·里根、乔治·布什、比尔·克林顿等九任总统。

的优势，这种技术使得新闻报道能够及时快捷地到达受众。但同时，也让那些不够格的人士借用新闻记者的口吻和运作方式传播资讯，以致模糊了新闻从业者和娱乐业者的本质区别。

许多脱口秀主持人都持极右的政治观点，但是他们却被认为是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新闻工作者必须是超然的，他们只从事报道，而不像那些每天在电视上高谈阔论的“会说话的脑袋”。除了严肃的纪录片，很少有半分钟的电视新闻片段能够与报纸的深度报道效果匹敌。

科技给新闻信息的采集方式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录音机、移动电话、数码相机、卫星传输、互联网等等都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被联机和进入镜头。对于那些想掩饰什么的官员而言，他们几乎无处藏身。如果他们说谎，他们的言行可以立即被回放。可是，在把报刊的内容转化为短短的原声片段以及带有娱乐性质的新闻的时候，某些重要的东西肯定失去了。

还有，那些买下传媒终端的公司影响越来越大，试图控制新闻编辑方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新闻的底线和形式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现代社会，非传媒公司对媒体的并购、利润线管理、娱乐充作新闻、24小时新闻循环，凡此种种都破坏了我们一度所理解的报业新闻的内涵。

那些只靠一份报纸作为新闻来源的小城镇在日渐消失，美联社作为美国唯一的通讯社的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人们如今的视线转向了广播和电信，这当然包括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的互联网。

不幸的是，当今媒体的公信力前所未有地受到了政府、政治和宗教团体以及形形色色公众的抨击。这些批评者和公众有史无前例的新闻渠道，也更加见多识广。官员们只有在他们需要（指媒体）的时候才要我们出场。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新闻事业卓越项目”（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①的汤姆·罗森斯蒂尔（Tom Rosenstiel）说：“美国人认为，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更加马虎，更不专业，关怀更少，更加偏心，对于所犯错误更不诚实，而通常给民主带来了更多的伤

^①新闻事业卓越项目组织（<http://www.journalism.org>）是美国的一个无党派非营利性研究机构。该机构通过观察的方式评估和研究新闻媒体的能力和成就。

害。”

如果这还不足以发人深省的话，那么还有近年来政府对新闻的管理和操纵，以及一个消极的新闻界表现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的丧失。我认为，媒体不再坚持其探究事实真相的黄金准则，从而令国人失望。

别以为公众还没有看出当今记者奇怪的新缺点——或者说是他们老板的缺点吧？他们如此频繁地屈从于政府部门的审查制度，忘记了一个彻底自由的媒体应该扮演的角色。公众曾经就电视直播的白宫记者会上记者没有提出显然应该提的重要问题而质疑媒体，我对此非常感叹。

通用电气（下辖全国广播公司）、维亚康姆（下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迪斯尼（下辖美国广播公司）究竟对新闻自由有多在乎呢？这点人们不能不质疑。它们有勇气冒得罪白宫、失去广告商的危险而不顾一切地直抒己见吗？

没有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就没有民主可言。对开国元勋们馈赠给我们的这个社会而言，一个自由的新闻界是不可或缺的。可是，这些企业或机构明白或者在意它们的公共服务角色吗？

还记得2003年10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影计划《里根夫妇》（*The Reagans*）引起的政治骚动吗？保守派们草草看了一眼就被激怒了，威胁要联合抵制这部对已故前总统里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并非百分之百赞美性描述的影片。该电视网最终放弃了在黄金时段播出这部影片的计划，而把它送到潜在观众远不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有线电视节目《表演时刻》（*Showtime*）去了。千万别低估了政治施压的力量。

曾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和有线电视新闻网资深广播电视工作者，现供职于全国公共电台的丹·斯科一针见血地说：“最关键的是，那些决定在什么事务上花多少钱的人对于新闻完全没有兴趣。这些人在乎的是利益，这是他们对媒体最关注的焦点，因此彻底改变了媒体的性质。结果是，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八卦新闻、性、暴力等，那些东西有人看。这样的内容娱乐听众观众，从而扩大收听、收视率……”

“最后，一切都向钱看了，”斯科说，“当然还有收视率。”

但是，以往各大电视网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出色的新闻报道曾经比金钱

更能打动那些大老板。

斯科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外驻在全世界的记者每年都要回到美国，并与公司主席威廉·S.佩利（William S. Paley）共进午餐。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能发展成为广播电视网中的凯迪拉克或者蒂凡尼，佩利功不可没。

驻外记者问佩利：“你担心播出有争议的纪录片以后会招来麻烦吗？那不会影响你的利润线吗？”

佩利对此回答说：“你们只管找故事，我来操心利润线。”

在另一个版本中，佩利说如果找来喜剧演员杰克·邦尼（Jack Benny），那会赚更多的钱。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佩利对爱德华·R.默罗（Edward. R. Murrow）那部给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致命一击的纪录片《“不忠与异见”之辩》提心吊胆。麦卡锡对左翼一直采取各种迫害手段。最后迫于压力，佩利屈服了，让默罗到《面对面》（*Person to person*）节目与名流对话，因为这个节目的争议比较少一些。

在“9·11”纽约世贸大厦和华盛顿五角大楼遭遇恐怖袭击之后，政府对媒体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乃至威胁，让媒体与政府保持口径一致。许多人认为，在这个冲突的关头批评政府的过失是对国家的不忠。

最过分的新闻干预莫过于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和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打电话给传媒公司，警告它们不要再播放从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那里传出来的录像，因为他可能会通过节目给尚未行动的武装分子传递秘密信息。在我看来，鲍威尔和赖斯越界了，滥用了官方的权力。

各大电视网在政府的胁迫下立即俯首帖耳，在“9·11”之前，大多数独立主编和发行人绝对会反抗这种威吓行径。

我已经记不得自己最近被问了多少次“现在的新闻界究竟怎么了？”

说来悲哀，新闻界在许多方面玷污了看门狗的角色。由于这个行业有某些追求名利的害群之马，新闻职业形象受到了严重损害，同时也给“糟糕的判断力”这个词带来了新的含义。名声、地位对于某些人而言确实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力，但总的来说我相信，年轻一代有抱负的新闻从业人员依然有

新闻理想。

在2004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华盛顿邮报》辛迪加专栏作家戴维·S.布罗德(David S. Broder)直截了当地指出,在公众心目中很有分量的两张报纸——《纽约时报》和《今日美国报》的主编被迫辞职,因为报社中有记者虚构了新闻故事并涉嫌剽窃他人作品。

结果,在全国范围内,对记者和编辑来了一场大清洗,当然,这也是有必要的。可是,它也给那些留下来收拾残局、有能力的新闻工作者带来了萎靡的士气和恐慌。

布罗德说:“职业实践与责任规范经历了如此重创后,很难摆脱这次打击的阴影。”

《爱国者法》^①有些可怕的条款,新闻界本应该进行严厉的审视,但是却没有。巴格达附近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照片曝光之前,几乎没有报道涉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俘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合法权利。只是在那些照片出来之后,媒体才如梦方醒,公众才开始抗议。但还不仅仅是这些。布什总统曾发誓,战俘和被拘留者都将得到人道的待遇,而讯问者在审问过程中一定会恪守不使用酷刑的规定。

不过,媒体的表现也有过光辉的时刻。那是在2002年底,底特律报纸起诉司法部,以获得对阿拉伯羁留者的驱逐听证会的公开报道……最后,他们赢了。底特律的联邦大法官达蒙·凯斯(Damon Keith)评论说:“关起门来,民主就死了。”

我觉得,新闻界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尤其在“9·11”后小布什总统的第二任期内。面对政府尤其是白宫的控制和干预,媒体没能保证民众的知情权。

换言之,记者在政府的“反恐王牌”面前屈服了,并缺乏勇气或能力看穿白宫每日新闻简报会中所宣传的各种虚假甚至编造的信息。

①《爱国者法》于2001年10月26日由美国总统布什签署。该法案是在“9·11”事件不久之后颁布的针对恐怖主义活动的一部联邦法。该法案的条款有两项争议最大,其中一项是漫游窃听条款,另一项是搜查记录条款。目前,美国各地已经有上百个司法管辖区颁布决议和法令,谴责《爱国者法》对民权构成侵犯。

国家安全档案部执行主任汤姆·布兰顿（Tom Blanton）说：“这些白宫保密的东西对于国家安全或者反恐几乎都没有多少保密的价值。这样做只是为了藏起更多秘密而作出的意识形态般的反应。”

五角大楼拒绝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到戴勒维尔的多佛空军基地拍摄覆盖着国旗的战死士兵的棺材从伊拉克回到美国的场景，出版与广播的高层也没有作出抗议。这些新闻机构本来应该死死地猫在多佛的大门口，然后一一清点飞回的军用飞机，如同我们过去在白宫作的现场发送报道那样。

而当今的新闻主管们居然也相信五角大楼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也不清楚有多少伊拉克人在国家被征服和占领时被杀。

半岛电视台（Aljazeera）的记者采访伊拉克被拒，美国的广播电视或其他媒体也没有发出应有的声音。我相信，在过去的其他时候和战争中，当新闻报道由于政治或安全原因而受到故意阻碍时，人们会有更多的敏感和考虑。

新闻界的智库——自由论坛的保罗·麦克斯特说：“信息跟子弹和炸药一样具有威慑力。”

在太多的时候，由于害怕政府的打击报复，主流出版物不得不屈服，麦克斯特担心白宫会因此利用“新闻媒体违心症”现象，一再对新闻媒体发出指令。这种手段连连得手，以至于五角大楼和其他联邦机构也有样学样了。政府部门接连照此办理，记者被捏在手心，最后失去了力量，导致新闻界只能俯首。

20世纪最优秀的广播记者之一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这样表述：“新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往往不是新闻工作者遵循国家政府的路线，而是他们勇敢地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时刻。”不幸的是，现今太多的新闻工作者都认为屈从于权势是他们接近高层的必要。

美国第一份报纸是一个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人于1690年创办的。他说，他要用这份仅有3页的报纸来“整治我们中间谎言的流传”。但是，仅仅出版了一期，报纸就被官方封了。

自开国以来，新闻事业对美国整个国家的民主化发展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791年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

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是美国最早的新闻工作者之一，他拥有一家印刷厂，因此有条件创建自由媒体。他由于批评纽约殖民地方政府被抓，但陪审团却驳回了他犯了所谓的“煽动罪”一说。曾格的律师帮忙打赢了这场官司，他最后的辩词是：“我们国家的法律赋予了我们这样的权利……有揭露和反抗不受控制的权力的自由……不论是用说出还是写出事实真相的方式。”

看来，过去的记者相对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职业理想，这令他们有别于社会中的其他人。他们以当民主以及《权利法案》^①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人为己任。

试想，如果记者没有了活力、热情、正直诚实、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勇气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写下美国20世纪最优秀记者们的早年生活片段。我非常有幸地结识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甚至还嫁给其中一位。

在那个时代的一大批优秀记者当中，我所认识的有：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二战”战地记者厄尼·派尔（Ernie Pyle）；普利策奖获得者、合众国际社记者梅里曼·史密斯（Merriman Smith），他是白宫记者团的灵魂人物；我的丈夫、美联社的道格拉斯·科内尔（Douglas Cornell），他是通讯社的标志性人物，负责撰写综合报道；报道过西班牙内战的马莎·盖尔霍恩（Martha Gellhorn）；出众的政治和国际事务记者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玛格丽特·希金斯（Marguerite Higgins），她在朝鲜战争一开始就随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飞往危机四伏的韩国；爱德华·R.默罗，“二战”期间德国对伦敦进行地毯式轰炸的时候，他不顾一切地坚守在播音岗位上；出版家I.F.斯通（I.F.Stone）；专栏作家沃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詹姆斯·雷斯頓（James Reston）；资深调查性报道记者杰克·安德森（Jack Anderson）；等等。

^①《权利法案》指的是美国宪法中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内容见附录。

看看谁是从当今伊拉克、阿富汗以及中东的冲突当中产生或者说造就的记者“明星”，也算是一件趣事。在越战期间，脱颖而出的有美联社的彼得·阿内特（Peter Arnett）、《纽约时报》的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时代》周刊的戴维·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等。

以身殉职的记者丹尼尔·珀尔（Daniel Pearl）的父亲朱迪亚·珀尔（Judea Pearl）说：“从本质上说，新闻工作者体现了一个开放社会最根本的力量以及最根本的弱点。”

我曾经常有机会向最有权力的国家公仆——美国总统——提出质询。我承认，在我行使这份职责的时候我是心怀敬畏的，但我的对象是机构而不是职掌这个权力的人。有一点确信无疑，我认为我们的职责不是去崇拜任何领袖，而是始终把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看看他们有没有辜负公众的信任。总统们都需要手按《圣经》宣誓，要“维护、保护和保卫”美国宪法。他们在所有的事务上都必须被考验、被质询。他们的地位和工资都是美国人民给予的，他们也必须永远对人民负责。媒体相当于中介，承担着把事实、数据和政策传播到大众当中的传输纽带的作用，同时向读者、听众和观众解释新闻含义。

新闻媒体于民主而言之所以如此无可取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是唯一能够不断地质询总统和政府官员的机构。宪法没有要求公众领袖被挑战，但是，如果一个领袖不受公众的质询和监督，他就既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来统治行政，也可能私下秘密地按照个人意愿行事。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国王，也没有拥有绝对权力、不受限制或者不被质询的专制者。我们有的是一套政府的制度，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之间起着审查和制衡的作用。但是，除此之外，一个自由社会还需要靠媒体来保证政府的诚信。

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至理名言：“自由的代价就是需要恒久的警惕。”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个自由的新闻界如此重要？我们是否已经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意义觉得含糊了？媒体是否已经辜负了它们的客户——公众？宪法《第一修正案》是否已经遭受到威胁？

在本书中，我找了许多在岗或退休的著名新闻工作者、离任或依然活跃

的白宫新闻发言人来告诉我他们如何看待和理解今日的各种媒体，今天的新闻界究竟是什么样的，昨天又是什么样的，还有，明天又将会是什么样。

我并不认为新闻事业已经夕阳西下。我相信，新闻将会比过去更加重要，而世界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也正在采用我们的模式——迫使政府官员对人民负责。新闻工作者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尽管记者时不时会遭遇各种辱骂，但是记者仍然受到高度尊敬，只要他们能够毫不松懈地追求真相以及正面的结果。

我期盼，未来的岁月里，新闻工作者将继续坚守职业准则，并且明白他们在国内外保卫民主制度、保证思想不断自由交流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记者必须能够独立而自由地运作。在权贵面前，他们必须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用挑剔的眼光监督失信于公众的官员。媒体不应该参与任何取悦于公众的竞赛，但是，只要他们保持真诚和恪守职业良知，他们就会受到尊敬。记者必须是超然独立的，但他们也必须具备社会关怀。

他们中大部分人清楚，这不仅仅是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2005年12月

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